

中華傳播學往何處去

陳國明

摘要

華人傳播學教育與研究正值轉型之時，更是面臨如何建立一個學門的挑戰時刻。本文以中華傳播學往何處去為題，從中華傳播學發展沿革、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以及中華傳播學未來的挑戰三個面向，分析建立中華傳播學門的正當與迫切性，提出建立中華傳播學門的理念與方法的建議，並且說明建立中華傳播學門所面對的未來挑戰。

關鍵詞：中華傳播學門、概念層次的建立、應用層次的建立、未來的挑戰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為1987年美國國家傳播學會博士論文獎得主。曾任中華傳播研究學會創會會長。主要研究領域在於文化間/組織間/全球傳播學。目前擔任兩個專業期刊編輯，以及多本期刊編輯委員。電郵：gmchen@uri.edu

Where to Now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CHEN Guo-Ming

Abstract

It is critical time for scholars and educators in Chinese societies to establish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order to provide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ies, this paper first delineate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justify the need for developing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Directions are then propos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ual and application levels. Finally, future challenges, including close-mindedness vs. openness of a discipline and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re described.

Keywords: discipline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nceptual and application issues, future challenges

中華傳播學往何處去

包括香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大中華區域的傳播學教育與研究，正面臨著嚴厲挑戰的時刻。這個挑戰鋪陳了轉型的基礎，也佈下了淪落的可能。尤其是穩固的學門未立，新的潮流卻是猛力衝擊之時，中華傳播學的路怎麼走，是整個華人傳播學界的同仁必須集思廣益，共同面對的問題。本文就以對中華傳播學往何處去為題，分三個部分來分析如何建立中華傳播學門：一、中華傳播學發展沿革；二、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以及三、中華傳播學未來的挑戰。

中華傳播學發展沿革

經由符號的交換，相互傳遞訊息的傳播過程，是不論中西的人類社會所共同從事的活動。但以傳播作為一個研究的概念，進而發展成一個學術領域與學門，則是西方的產物。在西方，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理論，在希臘時期，早就已經為人類溝通/傳播的研究奠下了基礎。不過，大量與有系統的傳播研究，乃是因為十九世紀西方社會巨大變遷的推波助瀾，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才正式開始的。連「傳播研究」(Communication Study) 這個詞語，也是直到1940年代，才在美國出現。至於傳播學門真正的建立，則是與演辯學(Speech) 與新聞學(Journalism) 分分合合，折衝樽俎了幾十年，才在1960年之後，一路顛簸走來，慢慢地形成(陳國明，1999a，2001；Delia, 1987)。

華人社會則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由新聞學主導，香港和台灣的發展比較順利，大陸則因政治上以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為統治政策，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三十年之間，幾乎與外界隔絕，新聞學教育與研究無所進展(陳立丹，2005)。不過在改革開放之後，則如雨後春筍，發展開始蓬勃起來(Zhang, 2006)。

八十年代之後，因為傳播學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猛進的發展，華人世界也慢慢跟進。不過由於一直以新聞學掛帥，加上過度依賴實用的取向，因此只重視傳播學門的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 一個領域而已，造成了學門發展失衡，學界版圖不全的現象(陳國明，2003a；

Chen, 2002)。以大陸為例，這種領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可以從1981到2001年之間，大陸傳播學者的專著與譯著的統計資料明顯地看出來(張健康，2003)。其中，如人際傳播學與組織傳播學兩個傳播學門的重要領域，只佔了3.2%的比率，其他部分幾乎都與大眾傳播有關。至於如公共傳播等其他傳播學領域的著作，則付之闕如。就是2001到2004年之間，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的主要成果，還是集中在傳播理論、WTO與中國媒介產業、媒介集團化與資本運轉、網絡傳播、新媒體、以及廣告與公關等方面(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2003a，2005)；至於新聞學的研究，則仍然以新聞相關主題為對象(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2003b；浙江大學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2005)。

除了過度重視實用取向而導致版圖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之外，整個華人社區的傳播學研究，更是毫無自主性，不論理論或研究方法，幾乎完全跟著西方的腳步走(Lee, 2005; Leung, Chu, & Lee, 2006; Wang, 2006; Wu, 2006)。Chen & Miike (2005)指出，華人傳播學學界這種過度西化的根源，出自兩個原因：一是對中國固有文化與傳統缺乏深刻的認識，二是學者缺乏思辯或批判的思考能力。

對固有文化與傳統缺乏認識，起因於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動盪不安，造成了文化的斷裂，致使學子無法經由正規的教育系統，獲取文化的知識與認識固有傳統的內涵。縱使知識精英試著圖強與改革，但是終究無法扭轉局勢。缺乏思辯或批判的思考能力，則可能起因於學術訓練或外語能力的不足，加上學術資源的匱乏與個人短視或速求一夕成名的動機，結果造成了慵懶、投機、不求精、抄襲等非專業，沒有學術理性的作風。對思想的多元性、多層性、與多變性，也就無意，更無能力加以理會(何愛國，2005)，導致了研究水平低落、粗製濫造、假冒偽劣、以及原創性的喪失(王曉華，2002；沙林，2001)，更不用說經由類比與批判來探討建立本土性傳播學的可能性了。

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大陸三十年文革的動盪，對整個學術現代化的發展，無疑地產生了重大的阻礙。香港與台灣傳播學界，思想與方法受到西方閹割宰制的情況，也頗為嚴重。海外華人傳播學者的研究，在內涵上顯得比較均勻，對傳播理論也時而提出質疑與挑戰(陳國明，2001)，不過根浮異域，對整個華人社會傳播學門的建立，貢獻頗為有限。

華人社會傳播學界所面臨的這種困境，凸顯了清掃門戶，建立正規傳播學門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加上傳播的過程，對當今社會所帶來的激劇衝擊，導正傳播學研究與實務作為，已是刻不容緩之事。以下將討論如何建立中華傳播學門。

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

一個學門的建立，立基於專業主義 (professionalism) 的出現；專業主義表現在學術的規範化，學術的規範化起源於學術理性與學術的自主性。

學術理性與學術的自主性乃是一個銅版的兩面，彼此互證，相輔相成。一個具有學術理性與自主性的學門，在學術生產與交換的過程，有其嚴守的自覺、反省、與批判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意志，以及可依循的一套具有一貫性的認知與分析方法 (姜義華，2000)。換言之，學門自主性取決於架構在學術理性的其自身內部的規則，經由嚴謹的內部規則的實踐，而建立起該學門權威的正當性 (legitimacy of authority) (劉擎，2005)。唯有權威正當性的建立，學門自身的論述話語才有其立足與馳騁的場域，也因此學門才能在學術界真正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

華人社會的傳播學門既無一套原創性的知識與論述話語，也無獨立自主的學術領域與地位，學術權威的正當性更付之闕如。可以說，華人社會根本沒有一個可資信賴，甚至受到公認的傳播學門。只要仔細的觀察，便可以發覺，華人社會傳播學界包括研究、發表、與課程教授的學術生產過程，以及包括與研究、發表、與課程教授息息相關之評估與交流的學術交換過程，缺乏一套在操作上可以依據的既客觀又一貫穩定的標準。由此得知，華人社會並沒有「重建」傳播學門的問題，而只有怎麼從頭開始建立傳播學門的問題。

何以有必要建立華人傳播學門呢？如前所述，西方傳播學萌芽於希臘時期的修辭學研究，到了十九世紀因為西方社會受到工業化、都市化、以及教育普及三大潮流的衝擊，使得對媒體的研究與如何獲取人與人之間有效溝通的知識與技巧，成為社會急劇的需求，傳播學門的必要性也因之而起。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傳播學也因此成為了一門獨立的

學科(Delia, 1987)。雖然中國傳統對傳播沒有像西方那麼有系統的研究，但歷史上與傳播有關，如與傳、播、揚、流、布、宣、通、遞、詔、敕、表、懿、柬、疏、說、談、講、論、頌、吟、詠、唱等用語有關的意義與人類傳播的活動的記載卻頗為豐富(陳國明, 2002)。如今又面臨一波波交通與傳播科技突發猛進所帶來社會結構的衝擊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何有系統的從事傳播學的研究與落實傳播學教育，對華人世界的未來，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陳國明, 1999b)。

華人傳播學門的建立，可以從概念與應用兩方面著手。建立的先決條件在於首先賦予學門場域兩項基本的要素：多元主義與理性主義。多元主義與獨尊或一言堂相對。多元的學界，講求開放與包容，不容許話語霸權與學派專制等思想一統的現象存在。理性主義與泛道德主義相對。理性化的學界，以理服人，不以情壓人，也不受行政、經濟等外部場域之權力的誘惑與侵犯。

概念層次之建立

學術概念問題(conceptual issues)主要集中在學門研究與教學的核心概念是甚麼的界定，也就是「傳播」的定義、屬性、與範疇是甚麼的問題。概念層次的釐清，首先必須解答該概念具有普世性或特殊性的問題。那麼，「傳播」是一個具有普世性或特殊性的概念呢？可惜的是，華人社會傳播學界長久承襲西方的論述，似乎已認定傳播是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概念。因此，西方的傳播理論與研究結果，同樣適合華人社會。是耶？非耶？

作為經由符號的交換，以達到彼此了解的傳播過程，是一個普世的現象。因為只要是人類，其生存與生活，都是以口語與非口語符號的互動為基礎，推進整個社會之文化或文明的延續。不過，在訊息傳送者與接收者互動的過程，因為文化的差異，存在互動過程中的各個變項的屬性與功能，自然就產生了不同，而形成了傳播過程的特殊性。因此傳播學研究就具有本土性的特色。

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陳國明(2004a)指出，傳播學與自然科學的屬性不同。例如，物理、數學、工程、化學等研究是具有普世性的，因此

有舉世皆準的「物理學」或「數學」原理，但不該有所謂的「中國物理」或「中國數學」原理之類的東西存在。傳播學則不同，傳播既然是屬於人類行為，必然受到整個族群之價值觀的制約，因此所謂舉世皆準的「傳播學」原則，是值得懷疑的；而所謂的「東方傳播學」、「華夏傳播學」、「西方傳播學」、或「美國傳播學」等顯示本土傳播原則的用語則是可以接受的。也就是說，所謂的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中華傳播學」是可以建立的。

從這個論點，馬上可以發覺華人社會傳播研究過度西化的嚴重性。例如，在理論方面，華人社會的傳播研究幾乎完全沒有經由批判與測試過程，全盤橫向移植當今西方盛行之理論，如G. Hofstede 組織內的文化價值觀模式、E. T. Hall 的文化脈絡模式、W. B. Gudykunst 的跨文化溝通原則，與「子彈理論」、「皮下注射理論」、「沉默螺旋理論」等傳媒研究方面的理論，不僅充滿著華人傳播學場域，更被許多華人傳播學者未經驗證地全然接收。

這種把馮涼當馬京的視障做法，窒息了本土性傳播學發展的空間。因此，發展華人傳播學門，首先要捫心自問的是，以台灣傳媒研究為例，「若與其他社會的媒體生態有所差異，發展出一套能夠解釋台灣媒體特色的模式和理論，是否可能出現」(陳國明，2004b：34)？汪琪、沈清松、羅文輝(2002)、孫旭培(1999)、陳世敏(1998)、陳國明(2004c)、陳韜文(2004)以及臧國仁(2000)等學者，對本土性中華傳播學從不同角度也都有了論說。這也正是華人傳播學者如何縱向承接華夏文化傳統的問題。

橫向移植外來的學術理論、方法、或規範與縱向承接自身文化傳統的同時並存，是發展一個具有正當性與開放性學門的必要條件。要點是外來的資源必須建立在參照而非囫圇吞棗的基礎之上。唯有經由對比與批判的參照過程，外來資源移植的適當性才能開展出來。換句話說，西化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西化的過程必須經由批評過程來審核西方學術理論、方法、或規範是否真的適用。適用當然可取，不適用，則必須揚棄或加以修正以適應本土之所需。這是建立華人傳播學門不能不知與不得不做的基本需求。

縱向承接文化傳統不僅同樣必須經由批判的過程，而且必須更進一步達到從傳統走出來的一種創造性承接與延續。百年來中華文化斷裂的

爭論已佈滿學術文獻，不論是全盤西化、中體西用、西體中用、或穿越傳統(吳炫，2004)，比比皆是，在此不用細說。就直接以傳播學研究來印證。

中華傳播學的耕耘，不是意味著食古不化、死守四書五經、或照單全收傳統九流十家之牙慧。時代在變，就是三本論語也治不了一個家，甬談天下。當今現代性對人類行為之需求，其性質與前時截然不同，以厚古薄今之態度，或以古早的藥方思欲治療現今症狀，皆不符實際。因此，像這兩年來風行的文化保守主義，扛出孔學興國的極端復古之運動，都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不智之舉(王達三，2005；秋風，2005；陳明，2006；陳佔彪，2005；蔣慶，2000)。

但是文化傳統之潮流，不論是水波不興、暗潮洶湧、或巨浪排空，都具有持續性，也就是文化的核心價值通常歷久不衰，也因如此，所謂「中華傳播學」才有可能成立。所以，如何反思與詮釋中華文化的核心概念，創造出與時代同流的模式或理論，才有辦法合理的解釋當代華人的傳播行為。例如，Chen (2001) 以「和諧」這個核心價值概念，作為華人傳播/溝通行為的本體依據，發展出以仁、義、禮三個概念為經，時、位、幾三個概念為緯，編織出了華人溝通互動的脈絡或場域，並且以關係、面子、與權威三個相輔相成的概念，作為影響仁、義、禮與時、位、幾交互作用時的主要元素。一套異於西方，但可以用來解釋現代華人行為的本土性溝通理論，於是產生。

近年來，海內外越來越多有心的華人傳播學者，已逐漸注意到中華傳播學這個問題。例如，黃光國(2004) 探討「臉」與「面」與華人溝通行動的關連，蕭小穗(2004) 從「禮」的角度分析華人溝通行為，鍾振昇(2004) 的「氣」的華人傳播理論，祝建華(2001) 的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Chang & Holt (1991) 的「緣」與華人人際關係，Chen & Chung (1994) 的儒家思想與組織傳播的關係。甚至探討易經八卦的華人人際關係發展模式(陳國明，2004d)，道家的無為談判(黃鈴媚，2004)，風水與占卜對華人溝通的影響(陳國明，2004e；莊瑞玲，2004)，以及以方志學作為華夏傳播學方法的可能貢獻(陳世敏，2002)。

這些試著從中華文化提煉出適合解釋華人傳播行為的嘗試，在整個傳播學研究的數量上，雖然如滄海一粟，整體性的影響仍然微乎其微，

但卻是很值得鼓勵的方向。唯有縱向批判性與創造性地繼承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同時橫向地參照西方的傳播學理論與方法，在彼此互競互合的激盪過程，建立起在全球化脈絡下具有本土性的中華傳播學門，才是華人社會傳播學界所該邁進的正確方向。

總之，如陳韜文(2004)所言，在簡單的移植外來理論，因本土社會的特殊需求來修正或補充外來理論，以及本土的原創理論等三種建立本土化理論的方法之中，以第三種創新式的本土化最為理想。這也正是建立華人傳播學門所追求的目標。更確切的說，華人傳播學本土的原創理論，乃是創造性地繼承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包括諸如本體論的整體性(holistic)思考、價值論的和諧(harmony)取向、認識論的由連結性(interconnectedness)產生意義與知識、以及方法論的以直覺(intuitive)與非線性(nonlinear)的問題解決方式作為基礎等(Chen, in press; Chen & Starosta, 2003)，所建構起來的一套適合當今人類社會潮流的傳播學。

應用層次之建立

建立中華傳播學門在應用的層次，必須面對傳播教學與研究發表兩個問題。華人社會目前的傳播教學，除了因傳播內涵失衡而偏向傳媒，過度西化而依賴翻譯書籍與西方理論，以及因社會的急劇需求而造成技術導向的偏頗之外，還出現了教學資源重疊與校際或傳播系所之間缺乏合作的現象(陳國明，2002)。如何導正這些教學上的問題，是建立中華傳播學門必須面對的挑戰。

偏向傳媒或大眾傳播的教學固然有其歷史的因素，但一個學門的建立與鞏固，其學科版圖必須具有基本的平衡性。除了大眾傳播之外，傳播學的領域還有其他諸如人際間傳播學、小團體傳播學、組織傳播學、公共傳播學、文化/國際間傳播學等領域，以及如健康傳播與危機傳播等橫跨不同領域的新興學科(陳國明、陳雪華，2005)。不同學校因不同需求，可能注重不同領域，但在基礎的傳播課程，對這些領域的介紹是不可或缺的。另外，雖然不同學校對傳播領域有不同的側重，整個學門合起來，應該呈現出基本的均衡才對。

為了參照與了解傳播學的發展，引用翻譯或原文書籍是絕對需要的。問題在如何立足於本土文化的特性，來理性的批判西方的思想論著，以防止過度依賴甚或全盤接收的現象發生。紓解這種困境的方法，除了改善課程的設計之外，不外乎鼓勵學者在教書之餘，投入具有本土性與多視角的學術研究與發表的行列。

教學過度的技術導向，勢必導致重利不重義的弊病。協助學生畢業後找到一份良好的工作，固然是學校教育的目標之一，但學校絕對不能只像一家訓練技工的職業培植所；在賦予學生職業的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原創力與思辯能力的訓練，也就是除了專業知識之外，對通識與全觀傳播人才的培養(翁秀琪，2004)。如此才能盡到教育的社會責任，並使學生在事業的發展上，更具有潛力。傳播學門，尤其是新聞與傳媒兩個領域，實用與技術的需求特別強大，加上華人社會急劇的變遷，如台灣的解除報禁與大陸經濟的起飛，唯利是圖的現象，充斥著校園。中華傳播學門建立之時，如何矯正這種歪風，對傳播學發展的未來，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最後，華人傳播學界教學資源重疊與校際或傳播系所之間缺乏合作的現象頗為嚴重。由於資源的匱乏，加上山頭與形式主義的作祟，各校在傳播系所設立與課程設計方面，常有閉門造車、各自為政的情況發生。缺乏各校之間資訊的交換，結果造成系所重複的浪費現象。例如廣告、資訊、公關等熱門科系，各校搶著設立，也不管到底整個社會能容納多少，弄得到處都是相同的系所，超過市場的需求，形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學生在畢業後，失業情況也日趨嚴重。這種現象，甚至發生在同校的系所之間。例如，文化間傳播學在語言與傳播學系都搶著教，由於雙方處理這個科目的同質性過高，彼此之間若無法相互協調，無疑是浪費本校的教育資源。

在研究發表方面，一個學門的鞏固，必須由健全的研究/學術社區(research/academic community)來維持。前面所提到的學術自主與學術理性，乃是公平與權威性學術社區成立的先決條件。靠著傳播學者、教師、學生、以及相關科系與行業同仁的支持與投入，經由彼此之間思想與意見的折衝樽俎所建立起來的這個「學界」或研究/學術社區，是傳播學門研究與教學規範立訂之所。除了教學內容的建議與教學評估標準的制

定之外，對各學校傳播教學的認定 (accreditation) 也能提供必要的標準與實際的操作。至於研究發表的規範就更不用說了。

學術社區以學會為主要的建制。除了全國性的學會組織之外，區域與地方性的學會同時存在，但學術精神與追求目標與全國性的學會不該有所抵觸。以美國傳播學術社區為例，NCA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為全國性最主要的學會，在其底下，有東部、西部、中部、與南部四個區域性傳播學會，另外，很多州也有該州的傳播學會。其他如 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與 AEJMC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等跨國性的傳播學會，也都具有類似的性質。

專業學會提供兩大功能。一是舉辦學術研討會，提供來自各方的傳播成員交換研究所得與教學心得。二是發行傳播期刊，提供空間予學者發表研究的成果。經由學會的活動與成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共同學術規範，可以防止目前華人學術界所存在的諸如循私關照、近親繁殖、研究造假、抄襲剽竊、情理不分、販賣文憑、獎賞自訂、評鑒虛假、資源壟斷等無奇不有的學術腐敗的可怕症狀 (亦明，2005；何愛國，2005)。

華人傳播學界，至今尚未有個強大有力的學會。台灣的「中華傳播學會」(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於1996年成立，並以「中華傳播學刊」為核心期刊。雖然每年舉辦一次研討會，但對整合台灣整個傳播學界的成果，仍有待增強。傳播學會與具有影響性期刊在香港尚未見到。在大陸則是處於爭奪時代，不同學會 (如「中國傳播學會」——CAC 與「中國跨文化傳播學會」——CAIC) 與刊物因經濟起飛與政策的開放，可說是風起雲湧，像雨後春筍一樣迸現。可惜的是，要產生一個能夠整合全國傳播領域的學會與嚴謹可靠的傳播期刊，恐怕仍有待時日。海外華人傳播學界，則有1990成立的 Chinese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CA) 與1991成立的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ACCS) 兩個主要的學會 (陳國明，2003a)。這兩個傳播學會，對華人傳播研究十餘年來的貢獻，尤其是在西方世界介紹華人傳播學的戮力，實在功不可沒。但是因為屬於海外的組織，真正對華人社會傳播學門的建立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因此，在中華傳播學門建立的同時，如何發展出一個整合性的學會

組織，然後逐漸建立相關性的其他學會，來規範化華人社會傳播教學與研究發表，乃是當務之急。沒有規範化或缺乏專業主義，健全的傳播學門的建立，將遙遙無期。學門不存在，傳播學的學術認同或身份(identity)也就無法受到認定，永遠只是個其他學門的附屬領域，枉費了傳播學者對理想的追求。

未來的挑戰

時代潮流變化洶湧，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除了必須以多元主義的開放態度與理性主義的實踐，來解決概念與應用兩個層次所要求的傳播學內在的基本問題之外，同時還得面對一波又一波外在的衝擊。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在目前與未來必須面對的外在衝擊，主要來自全球化對當今人類社會的影響。全球化潮流的動態、滲透、連結、混合、以及強化個人等特性，對社區意識、文化認同與多元、全球化媒體、以及全球化社會市民身份的衝擊(陳國明，2003b；Chen & Starosta, 2000)，無疑直接影響到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其中兩項挑戰特別值得華人傳播學界注意：學門的翕闢與新科技的影響。

學門的翕闢

翕，閤戶或內斂之謂；闢，開戶或外延之意。內斂凝聚之力，是學門認同與鞏固的基礎；外延開放之力，是學門與外界聯繫與成果分享的基礎。有如朱熹在『中庸』的引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能先退而紮實經營本土的功夫，而後又能自如往外輻射，與全球互動。

全球化社會包含三個社區層次：在地社區、區域社區、全球社區。這三種社區形成了一條由翕到闢的連續線，華人傳播學的地發展，除了必須凝聚成一個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傳播學門，還要外延到與區域和全球社區競合的地步。區域社區包括鄰近的亞洲諸國的傳播場域，然後是全球各地的傳播社區。換句話說，中華傳播學門建立後，必須馳騁於在地到全球這條連續線上，與國際接軌和對話，而非門戶閉鎖，敝珍自

掃。也就是：「要求華人傳播教育與研究，必須紮根於自己文化土壤的同時，能夠把聲音投射到全球的脈絡」(陳國明，2000：20)。雖然內部的整合為往外發展的基礎，但是以華人傳播學立基之晚與當今時代變遷之快速的情況來看，中華傳播學門的內在鞏固與外延聯繫必須雙管齊下，同時進行，才能與時並進，與時代潮流合一。

新科技的影響

科技，尤其是交通與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不僅改變了人類思考與生活方式，也直接影響了整個教育與研究的系統。由於諸多新科技與傳播的關係緊密，對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的衝擊，可說是更甚於其他學門。例如，當今新科技最主要的影響，乃是來自媒體的數位化(Abernethy & Allen, 2003)。數位化具有把傳統類別性(analog-native)的媒體(如報紙)結合與轉換成數位性(digital-native)媒體(如電腦)的驚人功能。媒體數位化對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的衝擊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認知系統、社會性的影響、以及新的數位美學觀(Chen, 2006)。

數位化對認知的衝擊，在於它的非線性本質以及製造對訊息內涵的期待所直接對學生或大眾使用媒體方式的影響。這與傳統的線性思考與操作方法截然不同。去大眾化(demassification)是媒體數位化所帶來的最主要的社會性衝擊(Olson & Pollard, 2004)。傳統的大群同質性受眾的情景將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讓受眾各取所需的訊息獲取模式。這種從大眾到個人化的重大轉變，對文化、政治、以及人類社會其他各方面，無疑將帶來革命性的影響。

最後是數位化的新美學觀。數位化乃是傳統印刷與先進的電子媒體二進碼(binary code)模式的混合體，因此需求一個與傳統完全不同的生產與分配的方法。這種轉變除了影響人們的認知系統之外，更影響了審美的觀點。Olson & Pollard (2004)指出，數位化美學觀的差異表現在它的互動性、操縱性、跨媒體訊息內容目的的先定與再定、虛擬經驗的刻意製造、以及對生產訊息不同內涵的樣本測試手段。

從以上三個面向，足見媒體數位化對人類生活與行為鋪天蓋地的影響。這個影響對人類教育，不管在東西方社會，勢必帶來重新設計和再

造的要求。華人社會自然免除不了這個潮流的激盪，建立中華傳播學門之時，更需要掌握這個時機，與時俱進。

結 論

一個學門的建立，通常必須經過類似社會運動 (social movement) 的過程。社會運動講求流動性、急迫性、戲劇性等登高而呼的宣傳口號，但是，我們應該了解，這些只是達到告知、說服、或揭開弊端的過渡性手段，而非建立一個學門的目的。目前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可以說還是處於這個發聲的階段。因此如何快速渡過這個階段，以落實傳播學教育與研究的理念與方法，是華人社會傳播學界每一分子所該負起的責任。

本文不揣簡陋，以作者多年來對華人傳播學發展的觀查與研究，先從華人社會傳播學發展的沿革，論證建立中華傳播學門的正當性與迫切性；再從概念與應用兩個層面，提出建立中華傳播學門的理念與方法的建議。最後則從學門的翕關與新科技的影響兩方面，舉例說明建立中華傳播學門所面對的未來挑戰。

除此之外，本文因採取宏觀的角度，論述中華傳播學門的建立，許多論點無法做深入的分析，其中諸如「中華傳播學」這個概念的界定與內涵、如何均衡傳播學各個領域的發展、中華傳播學與其他文化之間可能的差異與共性、中華傳播學與西方傳播學之間的對話、以及中華傳播學如何因應全球化的挑戰等問題，都有待學者在未來的研究裡，更進一步來加以釐清與探討。

參考文獻

- 王達三(2005)。《儒教與中國》。上網日期：2006年4月16日，取自<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6969>。
- 王曉華(2002)。〈學術失範與中國學術的深層危機〉。上網日期：2006年4月12日，取自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http://www.edu.cn/20020401/3023947.shtml>。

- 亦明 (2005)。〈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上網日期：2006年4月21日，取自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http://www.ideobook.net/doc/ymdaodi.doc>。
- 沙林 (2001)。〈腐敗形形色色：誰玷污了象牙塔〉。上網日期：2006年4月12日，取自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http://www.edu.cn/20010827/209182.shtml>。
- 吳炫 (2004)。《中國當代文化批評》。上海：學林。
- 汪琪、沈清松、羅文輝 (2002)。〈華人傳播理論：從頭打造或逐步融合？〉。《新聞學研究》，第70期，頁1-15。
- 何愛國 (2005)。〈學術非理性：現象、危害、根源和治理〉。上網日期：2006年4月12日，取自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747>。
- 秋風 (2005)。〈儒家如何實現復興〉。上網日期：2006年4月16日，取自http://www.ica.org.cn/content/view_content.asp?id=4762。
- 姜義華 (2000)。《理性缺位的啟蒙》。上海：三聯。
- 孫旭培 (1999)。〈既要本土化，又要國際化〉。袁軍、龍耘、韓運榮 (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頁266-277)。北京：北京廣播學院。
- 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3a)。〈2001-2002年中國傳播學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報告》，第2卷，第1期，頁14-26。
- 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3b)。〈2001-2002年中國新聞學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報告》，第2卷，第1期，頁27-36。
- 浙江大學傳播研究所 (2005)。〈2003-2004年中國傳播學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報告海外版》，第1卷，第1期，頁1-12。
- 浙江大學新聞傳媒與社會發展研究所 (2005)。〈2003-2004年中國新聞學發展報告〉。《中國傳媒報告海外版》，第1卷，第1期，頁13-26。
- 祝建華 (2001)。〈中文傳播研究之理論化與本土化：以受眾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論為例〉。《新聞學研究》，第68期，頁1-22。
- 翁秀琪 (2004)。〈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上網日期：2006年4月21日，取自傳播學論壇，<http://ruanzixiao.diy.myrice.com/twcbjydhgyyj040523.htm>。
- 張健康 (2003)。〈論中國大陸傳播學到引進、發展與創新〉。上網日期：2006年4月5日，取自傳播學論壇，<http://ruanzixiao.diy.myrice.com/lzgd1cbxdyjfzycx.htm>。
- 莊瑞玲 (2004)。〈占卜與華人溝通行為〉。《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503-415)。台北：五南。
- 陳明 (2006)。〈即用見體說儒教〉。上網日期：2006年4月16日，取自<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2&ID=11369&page=1>。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三期(2007)

- 陳世敏(1998)。〈傳播學的位置：回顧與看法〉。《傳播研究簡訊》，第16期，頁1-3。
- 陳世敏(2002)。〈華夏傳播學方法論初探〉。《新聞學研究》，第71期，頁1-16。
- 陳立丹(2005)。〈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上網日期：2006年4月6日，取自<http://media.people.com.cn/BIG5/22100/28502/28503/3955362.html>。
- 陳佔彪(2005)。〈儒學第四次浪潮：激辯儒教〉。《社會科學報》，2月23日，頁1及4。
- 陳國明(1999a)。〈傳播學研究概觀〉。《新聞學研究》，第58期，頁257-268。
- 陳國明(1999b)。〈華人傳播研究教育前瞻〉。《新聞學研究》，第59期，頁179-181。
- 陳國明(2000)。〈全球化與本土化〉。《傳播學研究簡訊》，第23期，頁19-20。
- 陳國明(2001)。〈海外華人傳播學研究初探〉。《新聞學研究》，第69期，頁1-28。
- 陳國明(2002)。〈華人傳播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國傳媒報告》，第2卷，第2期，頁4-12。
- 陳國明(2003a)。〈2000-2002年華人傳播學研究：大陸以外地區〉。《中國傳媒報告》，第2卷，第1期，頁37-51。
- 陳國明(2003b)。《文化間傳播學》。台北：五南。
- 陳國明(2004a)。〈前言〉。《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1-2)。台北：五南。
- 陳國明(2004b)。〈台灣媒體的彌留與再生〉。《中華傳播學刊》，第5期，頁25-34。
- 陳國明(2004c)。〈中華傳播學研究簡介〉。《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3-25)。台北：五南。
- 陳國明(2004d)。〈易經八卦的人際關係發展模式〉。《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203-229)。台北：五南。
- 陳國明(2004e)。〈風水與華人溝通行為〉。《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483-502)。台北：五南。
- 陳國明、陳雪華(2005)。《傳播學概論》。台北：巨流。
- 陳韜文(2004)。〈理論化是華人社會傳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張力處理〉。《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45-54)。台北，台灣：五南。
- 黃光國(2004)。〈華人社會中毒臉面與溝通行動〉。《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311-336)。台北：五南。
- 黃鈴媚(2004)。〈無為談判者：道家思想與談判行為研究〉。《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265-294)。台北：五南。
- 劉擎(2005)。〈當代中國學術界「學術」與「思想」的分裂〉。上網日期：2006年4月

- 12日，取自世紀中國，<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744>。
- 蔣慶(2000)。〈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上網日期：2006年4月16日，取自中國儒教研究通訊，<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2184>。
- 臧國仁(2000)。〈關於傳播學如何教的一些想法〉。《新聞學研究》，第65期，頁19-56。
- 蕭小穗(2004)。〈禮與華人溝通行為〉。《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379-405)。台北：五南。
- 鍾振昇(2004)。〈氣的傳播理論與語文策略〉。《中華傳播理論與原則》(頁517-539)。台北：五南。
- Abernethy, K., & Allen, T. (2003). *Exploring the digital domain: An introduction to digital information fluency*. New York: PWS.
- Chang, H. C., & Holt, G. R. (1991). The concept of yuan and Chin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 Ting-Toomey & F. Korzenny (Eds.), *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28-51). Newbury Park: CAL Sage.
- Chen, G. M. (2001). Towards tran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 harmony theory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In V. H. Milhouse, M. K. Asante, & P. O. Nwosu (Eds.), *Trans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pp. 55-7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en, G. M. (2002).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y*. In W. Jia, X. Lu, & D. R. Heisey (Eds.),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Advance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pp. 255-268). Westport, CT: Ablex.
- Chen, G. M. (2006, July). *An overview of media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6 conference of Cross Boundaries: Glob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Media Age, Taipei, Taiwan.
- Chen, G. M. (in press).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What and where to now.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6.
- Chen, G. M., & Chung, J. (1994). The impact of Confucianism on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42, 93-105.
- Chen, G. M., & Miike, Y. (2005). 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 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China Media Research*, 2(1), 1-12.
- Chen, G. M., & Starosta, W. J. (Eds.). (2000).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 society*. New York: Peter Lang.
- Chen, G. M., & Starosta, W. J. (2003). 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 A dialogu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12(4), 1-15.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ee, S. N. (2005). The challenges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Asia. *Australian Journalism Review*, 27(2), 189-201.

- Leung, K., Chu, L., & Lee, P. (2006). Th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89–209). Cresskill, NJ: Hampton.
- Olson, S. R., & Pollard, T. (2004). The muse pixelipe: Digitaliz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2), 248–255.
- Wang, S. (2006).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 Taiwan.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59–176). Cresskill, NJ: Hampton.
- Wu, T. (2006).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K. Leung, J. Kenny, & P. Lee (Eds.), *Global trend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pp. 133–157). Cresskill, NJ: Hampton.
- Zhang, G. L. (2006).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tre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China Media Research*, 2(2), 103–111.